

聂峨亭传略

袁守彬 整理

1988年9月 是鱼台县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民主县长聂峨亭逝世43周年。时代的风雨冲刷了人民许多珍贵的记忆，但是，聂峨亭的光辉形象、高尚品德和卓越贡献，至今铭刻在鱼台人民的脑海中。

一

聂峨亭，以字行，名奉璋。1886年出生于鱼台县大聂村的一个新兴经营地主家庭。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清朝末年中末场秀才，后又到山东省立师范讲习所就读，接受了不少新知识，开阔了眼界。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民国之初，受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公开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道德、新文化。带头剪发，宣传放足。毕业后被委为鱼台县教育会会长。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行国民教育。身体力行，首

先废除了本村的私塾学馆。创办“鱼台县王鲁区大聂寨国民小学校”。在全县视察教育情况，提出改革方案，为普及国民教育而奔走。但是，当时封建的教育制度在鱼台县仍根深蒂固，腐朽的官僚根本不容许有丝毫改革。刚毅正直的聂峨亭，不甘同这些乌合之众相处共事，愤然弃官归里，辞去教育会长，埋头本村的教育事业。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他摆脱了教育当局的限制，大胆革新，以“民主政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创新，不为儒家经典及八股文所禁锢；组织学生作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宣传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公开为穷人打抱不平。学生思想活跃，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全县进步青年纵谈时务、交流思想的活动场所，培养造就了一批青年。1936年秋末，在峨亭指引下，雇工出身的聂振营到陕甘宁边区参加了工农红军。“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师生投身革命。后来，有的成为党的优秀骨干。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聂峨亭作为地方名流，应邀参加

了在济宁市召开的抗日后援会成立大会，会后，以大聂村为中心，组织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这时，在县内外执教的一批青年相继返里，聚集在聂峨亭周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时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也都闻风归同，武装不断扩大，到1937年底，发展到400余人，辖3个中队，以南阳湖边为活动中心。

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日军沿津浦铁路南犯。国民党鱼台县长杨启东预感大势已去，闻风丧胆，弃城携眷逃跑。骤然县内群龙无首，地方陷入混乱。鱼台县各界人士紧急推举聂峨亭维持全县局面，稳定了人心，安定了社会秩序。

1938年1月，共产党员马霄鹏、郭耕夫等与聂峨亭接触，共商抗日大计，峨亭愉快接受党的领导。当时，党处于秘密活动的情况下，对外依靠峨亭的威望，号召民众，开展抗日工作。不久，峨亭联合全县名流士绅，在谷亭成立了“鱼台县抗日司令部”，约1000余人，聂峨亭任司令。设参谋、副官、政训、秘书、军需、军械、军区等8个处，辖3个大队。我党派进政工人员做政治思想工作，约法三章，军令如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给鱼台人民留

下深刻印象。

1938年5月，日军侵占鱼台县城后继续南犯，敌后形势暂时稳定，国民党反动分子邓子卿、高隆年乘机收拾残匪败兵盘踞县城。7月，我抗日司令部二、三大队进驻县城，邓、高遂即发起武装围攻。司令部在王鲁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的一致意见，聂峨亭命令二、三大队，在县城东门外处决了这两个罪魁祸首，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开始收敛。不久，惯匪刘跃庭在单县挂起“七路”招牌，到处招兵买马，抗日司令部原三大队长郭坤池匪性难改，率部投靠其上司刘跃庭。司令部一、二大队进城整编，改称“鱼台县抗日自卫总团”（以下简称“自卫总团”）。团长聂峨亭，辖3个营。8月2日至3日，聂峨亭以鱼台县军事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在沛县马庄召开的丰、沛、鱼三县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组织三县联军，配合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发起讨伐丰县大汉奸王献臣（绰号王歪鼻子）战役。在这次战斗中，“自卫总团”胜利完成了阻击王匪向鱼台县溃败的任务，显示了我抗日武装力量的威力。

1938年7月，盘踞单县的七路头子刘跃庭为扩大其地盘，买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委托单县大地主朱启森来鱼台县充任县长。朱上任后，一不谈抗日，二不讲统一战线，极力分裂“自卫总团”武装。他采取“收买拉拢、巧立名目、分而治之”等手段，将从“自卫总团”分裂出来的部分武装，冒然成立了“县常备队”。朱凭借这部分“力量”与“自卫总团”相抗衡。

1939年2月，日军第二次占领鱼台县城后，组织了以汉奸张荫南为首的伪县政府。日伪军视聂峨亭为心腹大患，数次袭击谷亭，不见峨亭的影子，乃于太年初三倾城出动，直奔大聂，打死无辜群众2人，将峨亭家中的浮财掠劫一空。处此紧急关头，峨亭向县委书记郭耕夫提出，公开党领导的身份，报请参加八路军，将部队提到丰县吴庄苏鲁豫区党委随即授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湖边游击四大队”的番号（以下简称“湖边游击四大队”）。任命聂峨亭为大队长，郭耕夫为教导员，辖3个分队，县委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由此而诞生。日伪军闻讯后，采取报复手段，把峨亭大家庭中的12进院落焚烧一光，接着又把他大哥、三哥抓到县城作为人质。峨亭常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言词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敌人的凶残，只能使他更坚定地献身革命。

1939年5月，湖边游击四大队在单县短期整训后，担负保卫中共湖边地委的任务向鱼台转移。一天拂晓，部队到达鱼台县四区小聂村，得知惯匪唐玉德部即行去谷亭路过此地，峨亭当即命令埋伏截击。一颗手榴弹掷到唐匪脚下，未炸，唐匪调头逃窜，我部追至后庙村，唐匪躲在一座平楼上固守，我遂用火攻，风火相济，烟火冲天，唐匪在楼上扔下短枪投降就俘。八路军回县，旗开得胜，群情振奋。6月底，根据苏鲁豫区党委部署，在南阳一举歼灭国民党鱼台县五区区部及其武装。同日，苏鲁豫支队四大队（以下简称“苏支四大队”），在谷亭向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朱启森部发起攻击，俘获朱启森。7月1日，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李贞乾任县长；同时建立湖边司令部，李贞乾任司令。辖3个大队，湖边游击四大队被编为一大队，大队长聂峨亭。尔后，在苏支四大队的配合下，打击了土匪武装，平息了杆子会暴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其影响扩展到苏、鲁、豫边区各县。

三

正当鱼台县抗日形势蓬勃发展之际，混进党

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已死)利用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后叛变投敌)的军权和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严重错误,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湖西“肃托事件”。早期在鱼台县从事革命活动的领导人马霄鹏、郭耕夫以及“七·七”事变后跟随峨亭走向革命道路的本族侄孙聂锦堂、聂承三、聂振凜等人先后惨遭杀戮。他的儿子聂健民也被关押受审。峨亭失去景仰的党的领导人,失去寸步不离的左右膀臂,他痛心疾首,坐卧不安,他坚信他们不会走偏政治方向,断定“肃托”是肃错了好人,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去见白子明,当面愤然斥责:“你们这样大杀大砍,草菅人命,无疑是破坏抗日……。”白子明面对义正词严、威武不屈的形象,无法动怒,难以开脱,只好劝说道:“你老人家别生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请你不要管。”惨杀毫无收敛,蒙冤的家属哭天嚎地,被关押审讯的同志的家属更是朝夕尾随,哀求设法营救。好心人劝他“躲开”,留条老命。峨亭坚定地说:“大难当头,我怎能贪生怕死,弃置不顾。”他再次去见白子明,白推故借由,不予见面。峨亭并不甘心,晚上,他愤疾上书,严词苛责白子明是刽子手。此时,白、王

正在歇斯底里大屠杀，指责再严，言词再甚，何能劝阻刀枪入库。戮杀仍在继续，峨亭日坐愁城，寝食俱废，欲死不能。直到11月，山东军政委员会获悉这一事件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星夜赶赴湖西，“肃托事件”才告平息。这一恶性事件，使鱼台党组织失去一代精英，党辛勤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1940年2月，日伪军对鱼台连续“扫荡”，6月，苏鲁豫支队调离湖西前夕，把湖边司令部一、二、三大队编入主力，鱼台防务空虚，敌人占据了鱼台县大部地区，从而全县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难的岁月。

四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聂峨亭矢志不移，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对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和力量。1940年7月，县党政机关撤到丰、鱼县边境后，凭借他的群众基础和较高声望，保持同县内许多爱国志士仁人的联系。通过他的社会影响以及地下党员和社会关系提供的必要条件和安全保障，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其他同志经常出没于县内各地，开展隐蔽斗争，使鱼台县的抗日形

势有了新的转机。

1941年3月，峨亭调湖西专署任建设科长，在开展湖西各县有关业务工作的同时，对鱼台县的工作仍继续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942年9月，他同丰、单、砀三县大队夜间突入鱼台北部，包围了驻后李集的伪军，峨亭只身进入据点，说服争取了伪军中队长周常臣及部下50人反正。次日，他又亲临耿鲍庄伪军碉堡，争取周的儿子、伪军小队长周明智及士兵30余人反正。后在单县杨庄召开欢迎大会，军分区将这支反正部队命名为“挺进大队”。在鱼北一带隐蔽活动，配合金、济、鱼武工队袭扰、打击敌人，建立了南阳湖边游击区。

1942年8月刘少奇经微山湖交通线到达湖西，峨亭参加了接送工作。过后，少奇赠骑骡一匹，作为纪念。

1943年5月4日，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率部大举进犯湖西地区，其部某团团长张钦安系鱼台县仁和村人，时在丰县一带驻防。我党利用鱼台籍这个“关系”，由聂峨亭担负争取工作。他通过缪慕海、王传恩的疏通，商定在傅小楼与张钦安举行会谈。鱼台县长吕英、副县长聂峨亭（1943年初任）系我方代表。会谈

虽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张钦安在丰县一带驻防期间，未曾骚扰过鱼台县境，丰北一带也很少到过。

1943年初，日伪在鱼台县大挖封锁沟，沿沟设碉堡、布方城（规模较大的军事据点）。时称“三里一碉堡、十里一方城”。挖了从鱼台县城经谷亭到缪集的这条封锁沟后，使我鱼北、鱼南的联系一再受阻，鱼南沦为敌占区。为了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8月22日，湖西地委决定，鱼南一、三、七3个区、丰北5个区合建丰鱼县。王光中任县委书记，吕英任县长，聂峨亭任副县长。在鱼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建立了沿苏鲁边河的二、三十个村的抗日游击区。并以此为依托，向鱼台中间地带开展工作。

1944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山东军区负责组织近万人的兵力，发起微山湖讨顽战役，解放了湖东、湖西纵横百余里的大片区域。在此胜利形势下，为适应斗争需要，地委决定，恢复鱼台县建制，赵前任县委书记，聂峨亭任县长。全县设8个区。至此，鱼台县局面逐步稳定。

1945年3月，聂峨亭作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参加了在濮阳县召开的边区参议会

议。会议结束时，峨亭被选为赴延安参观学习的代表。行军途中受到敌军袭击，掩护部队和代表被冲四散，峨亭联络无着，只身跑回，一路惊吓疲劳，回县后卧病不起，9月与世长辞，享年59岁。

为了悼念鱼台人民最为仰慕的县长聂峨亭，中共鱼台县委、县政府召开隆重追悼大会，数百人在遗体前默默致哀，呜咽痛哭。湖西日报辟出专页介绍了他的壮丽业绩，被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50年1月，经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鱼台县人民政府追认聂峨亭为革命烈士。聂峨亭以他毕生的实践，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编者按：此材料由鱼台县党史征集委员会提供

回忆郭耕夫老师

仇裕民

耕夫老师，一九三六年夏到金乡胡集小学任教（是我的班级任老师）。在七位老师中（包括校长在内），郭老师的威望较高。他教学认真得法，学生成绩显著，他关心学生的课外阅读，组织看报、看杂志。他关心住校学生的生活，又能和老师们及校友们和睦共事，受到全校师生工友的尊重。

耕夫老师，在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到胡集小学不久，就入党了。

他的民族观念和民族自尊心最强。他经常说：“一个国家不能独立，受外国的侵略和干涉是最耻辱的！”他主动宣传抗日，每个星期六，就组织全校师生召开讲演会，并到集镇去讲演，宣传抗日。在金乡五区，无不知郭老师是坚决抗日的英雄。在“西安事变”后，郭老师更加积极宣传抗日。他逢集就到，逢会就去，深入人民群

众中去，亲自动笔抄写报纸上的新闻，向集镇上张贴。并经常向报社写稿。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郭老师编了一个剧本《殷汝耕出卖冀东》，后来改为活报剧，由学校编排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取得较好的效果。学生们议论：只有起来抗日才有出路。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耕夫老师既组织学校师生搞抗日的宣传活动，又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他提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为了组织抗日的队伍，他首先打进杆子会（又称红枪会）里面去，找到当地杆子会头目张茂贞，与其接触交朋友，并拜张为师。后来，结识杆子会头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白天教书宣传抗日，晚上到杆子会里面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到十一月份，游击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张为队长（张曾在西北军当过连长），郭老师为指导员，有长、短枪七、八十支。后来马霄鹏老师来了，到三八年二、三月间，队伍发展到二百余人，住在金乡县董楼。当时，困难重重，缺衣少食，更无零用钱。有一部分人吃不消，投奔范筑先去了。这时沈鸿烈派人来了，要改编这支抗日队伍。经三天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弄得人心慌慌，一部分

队员回家了。马、郭老师带一百余人投奔了李贞乾抗日义勇军。这一段时间我都在他身边。

一九三九年春，我又回到郭老师的身边，他在湖边工作团（湖边地委）湖边游击第四大队任教导员，不久升任金、嘉、巨中心县委书记。“湖西肃托”事件发生，耕夫老师被无辜残害在谷亭。

郭老师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他爱学生，爱同志，爱读书，最关心国家的存亡，最关心抗日战争，可称为抗日英雄。

郭老师是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不幸是我们党的损失。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成都军区衣冠庙离职干部休养所干部

悼念耕夫同志

于伟民

(一)

东北失守华北危，
胡集小学暂栖身。
交结同仁图破壁，
唤起工农定乾坤。

(二)

正期杀敌雪奇耻，
湖西“肃托”竟含冤。
而今四化向前迈，
告慰英灵笑九泉。

1980年元月30日于重庆

注：①于伟民同志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②于伟民同志原诗四首现选其两首

③摘录自《鱼台古今》第二辑

樊 照 坤 事 略

冯龙润供稿 渠昌时整理

樊照坤，字厚甫，一八九一年生，鱼台县武台乡樊庄村人，世代业农。十至十四岁私塾就读，后辍学。他为人性情豪爽，忠诚厚道，善于交际，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

樊照坤早年参加安青帮，徒弟甚众，是很有影响的帮会人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寇疯狂地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霸占我领土，屠杀我同胞，蹂躏我人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樊照坤激于民族义愤，目不忍睹国破家亡和中华民族惨遭奴役的悲惨情景，抱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利用徒弟多朋友广的有利条件，毅然决定组织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春节后，东奔西跑，串亲访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动中华儿女抵御外侮。

樊照坤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在不长的时间里，动员了本村和邻村的进步青年及各界有声望

的爱国志士一百多人，组织起了抗日队伍——民团，在万福河北的吕家村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侄子樊维善具体指挥。他除参加部队的组织领导外，还利用公开场合，揭露日寇的残酷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加入民团，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樊照坤与武台庙的住持刘跃周（刘的父亲是安青帮首领，世称刘老当家的）关系甚密。刘原系国民党部队的旅长，因战事避难在鱼台县武台庙，出家为僧，也是帮会首脑之一，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们的徒弟遍及苏北及鲁西南各个县区。其中有：绅士名流，有志青年，爱国志士，及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也杂有土匪和无业游民。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活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着有益或有害于社会的活动。这些人，有胆识，讲义气，对樊又极为尊崇。樊想，如果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是打击日寇的一支力量。于是便利用其特殊关系，收编了一部分扰害群众的小股土匪，从南阳湖里说服动员拉出来四小股队伍，共九十多条枪；从嘉祥、巨野等县动员那些不务正业、抢劫断路的三十多人。把这些人收编起来，对他们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少人改邪归正，成为抗日的勇士，壮大了抗日力